

世界历史人物丛书

不让须眉的女杰

李长林
李一兵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 员 —

作者简介

李长林，1957年生，沈阳市人。1982年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现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欧洲史学史、世界文化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有《世界通史·古代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新辨释》等著作和专业论文 近40余篇。

不让须眉的女杰

前摇摇言

我国清代文学家赵翼有诗云：“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杰出的人物层出不穷。在历史舞台上，漫长的岁月里，产生了无数出类拔萃的人物。这其中当然包括有杰出的妇女人物在内。但是过去在男权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她们的业迹，往往被忽视、被抹煞，这是不公平的，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女性在人类社会构成了两极中的一极，所谓“半边天”的她们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古往今来历史上的女性，举凡政治、经济、文艺、科技、教育、体育、思想等领域，都留下了她们奋斗创业的足迹。

本书选取了外国历史上 50 多位影响较大的女性杰出人物的业迹，略加评述，其中有艰苦奋斗、励精图治的政治家。有追求真理，献身人民的革命家。有揭竿而起、视死如归的女英雄。有妙笔生花、勤于创作的文学家。有才华横溢、表演超群的艺术家的。有发明创造、鞠躬尽瘁的科学家。有救死扶伤、博爱众人的慈善家。有奋力拼搏、技能高超的体育家。有哲理深奥、发人深省的思想家。

本书所以只选取了这 50 多位女性杰出人物，当然受到了篇幅的限制，同时也考虑到历史时期和地域的分布以及作者所掌握的资料，因此绝没有搞“排行榜”的意思。

人们常说，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但是，读者读完本

书之后，会说，不，女人的名字不是弱者。并且会发现本书所评述的女性，都是一些不平凡的人物，传奇般的经历使她们成为了生活中的强者，在历史上留下了英名，令我们今天读到她们的事迹时便会肃然起敬。

这些女中豪杰又是平凡的人物。她们所以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并不是因为出身名门世家，或者家蓄万贯，或者美貌绝色，而是因为她们都以自己的人格力量，在平凡中成就了不平凡。她们的事迹告诉我们，名人，伟人未必都是“命运的宠儿”。她们走过的人生之路，都不是平坦笔直，一帆风顺的。相反，在她们功成名就之前乃至以后，都遇到了不少坎坷，受到了不少挫折，遭到了不少失败，付出了不少代价。然而，她们屡经磨难，大志弥坚，凭着坚如磐石的决心、百折不挠的努力，终于冲破了“命运”的羁绊，走上了胜利的道路。

我们通过熟悉杰出女性人物的事迹，可以了解到女性的自信、自重、自立和自强的意识在历史上是怎样觉醒的。尽管她们生活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度，但她们觉醒的过程，令今天的读者仍然倍感亲切，颇受启迪。

巾帼名人的成功之路，对全人类的发展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作为一种精神财富，不仅是女界的骄傲，其感召力和非凡的魅力，理所当然地为须眉男儿所诚服。应该说，巾帼名人不仅是女性世界的楷模，也是男性学习的榜样。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除了一般性的评述传主的突出事迹外，还花了一定篇幅介绍了传主与中国的关系，这种关系既包括直接交往，也涉及交流影响。突出传记的“中国特色”这也算本书的一个新的努力。

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收集、参考了大量有关文献，如人物自传、评传、回忆录等专著，以及报刊上有关文章。在此恕不一一列举，谨对上述著作、文章的作者深致谢忱。

限于收集资料的困难，以及作者的水平，本书对人物的评述上，不可避免地存在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敬希各位读者、各位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本书有关科·阿基诺、玛·撒切尔、英·甘地、梅厄夫人、贝·布托、西蒙娜的评述由李一兵执笔，其余都由李长林执笔，特此说明。

作者

猿 2005年 怨月于长沙

“世界政坛采访之母” ——意大利女记者奥·法拉奇

不让须眉的女杰

摇摇奥里亚娜·法拉奇是当代世界著名的新闻界风云人物。她从事新闻采访和写作工作达 源 多年之久，尤其擅长政治采访，被称为“和杰出政治家纵论天下大事的能手”，“创造新闻丰收的政治采访专家”。“世界政坛采访之母”。法拉奇在新闻采访中所表现的那种不怕牺牲、不畏权贵、不惧威胁，坚持新闻公正性与客观性的崇高职业道德，也为世人树立了表率 and 楷模。

“害怕，是我自己不能容许自己享受的一种奢侈；羞怯，是我无法承受的一种重负。”

——法拉奇语

摇摇摇摇佛罗伦萨的少女时代

摇摇摇摇年远月，法拉奇出生在意大利的历史文化名城佛罗伦萨。她共有姐妹四人。父亲是个木匠，母亲料理家务，全家全靠父亲的微薄收入维持生活，法拉奇年纪不大便开始帮家里干活，她也酷爱读书，看了不少文学和历史书籍，她经常为书中英勇献身的人物激动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声，打碎了法拉奇一家宁静的生活，父亲在源年代初加入了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组织，他常常在家中教育孩子们，认清法西斯统治的反动面目，鼓励他们为消灭法西斯，赢得祖国和人民的自由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法拉奇的父亲屡次遭到法西斯当局的逮捕，但他坚贞不屈，顽强地与法西斯分子展开誓不两立的斗争，父亲的英勇行为，给法拉奇以巨大的教育和鼓舞。她和几个姐妹一道参加了地下组织——自由志愿军。从此，年仅源几岁的法拉奇，悄悄地利用各种机会为抵抗运动的游击队员们运送枪支弹药，传递情报，张贴标语。这些传奇性的冒险行动，培养了自己坦然面对危险，无所畏惧的胆略与信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拉奇以优良成绩从伽利略学校的高中部毕业，随即考入著名的佛罗伦萨大学医学院。当时，法拉奇立志做一名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这大概与她在战争期间目睹了人们大批伤亡的惨状有一定关系。然而由于家境贫寒，她得想法挣钱交高额的学费，源岁的法拉奇在当记者的叔叔鼓励下，为支付学业费用，开始

用课余时间当地的《晨报》撰稿。自幼喜好读书且文笔不错的法拉奇初试锋芒，即获得成功，她首篇“试笔之作”被《晨报》主编看中，发表后得了意大利里拉的报酬。此后，她利用课余时间，继续给报社写稿，不断取得稿费，但这些钱毕竟是杯水车薪，难以应付高昂的学费，结果，她在医学院只读了两年便辍学了。这时，她发现自己具有从事新闻工作的能力，于是决定进报社去当记者，原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社会动荡不安的环境中，法拉奇对新闻记者能仗义执言、勇于出生入死地进行新闻报导很羡慕。有一次，她听说意大利著名的战地记者古里奥·黎里前往中国，去采访抗日战争情况，法拉奇对此大感兴趣。所以现在去当记者也是她的心愿。

摇摇摇摇艰难起步的记者生涯

摇摇摇摇年，法拉奇 5 岁时正式进入向往已久的《晨报》报社，担任采访各地新闻的专职记者，揭开了她漫长而丰富多采记者生涯的序幕。

缘年代的意大利新闻界，几乎是清一色男人独占的职业领域，从事新闻工作的女性寥寥无几。少数涉足报界的妇女一般也只能在编辑部做些日常琐事，但法拉奇却勇于出外采访新闻，她认为：“我只是人群中的一个人，而不是男人群中的一个女人。”她还认为：“害怕是我不能容许自己享受的一种奢侈；羞怯是我无法承受的一种重负。”根据这些信念，男记者干的事，她一定都去干。

远

有一次报社派她去采访一件刑事诉讼案。她刚在旁听席落坐，只听到法官大喝一声：“那个女孩子出去！”她站起来不卑不亢地回答说：“我是新闻记者，法官先生！”“哪有这样的记者！出去！”法官认为在审理这样一个案件时，让一个黄毛丫头来当新闻记者实在不像话，因此执意要把她赶出去，尽管法拉奇据理力争也无济于事，还是被赶了出去。后来，只得向别的记者打听情况。从业之初，她就是这样在“男人世界”里抢新闻。

更大挫折尚在后边，一次报社编辑听说意大利共产党书记陶利亚蒂要在佛罗伦萨举行集会，他把法拉奇叫来，要她马上写一篇讽刺文章。法拉奇反问道：“为什么写讽刺文章？我得到那里去，听听他说了些什么，然后再按照他说的去写。”法拉奇虽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她认为保持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是一个记者的职业道德的所在，然而她却忽略了《晨报》偏右的政治倾向。结果，她被叫到主编办公室，主编严厉地对她说：“谁也不会在自己的饭碗里吐痰！你被解雇了！”法拉奇万万没料到，自己的率直和诚实竟然会惹出这样一个下场。她感到非常痛苦。但她不乞求宽容，因为她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是报社的偏见容不得一个正直的记者。

1954年，法拉奇只身一人来到意大利首都罗马。到处奔走自荐，好不容易在《时代》周刊谋得一份工作，不料，这家周刊的上司主编也如同《晨报》一样，经常要她写一些违心之作。而她决不愿为了生存而出卖她视若生命一样可贵的新闻真实、客观的原则。她因此常遭受冷遇，没有发表多少东西，收入微薄到几乎无法生活下去，每天仅吃几片面

包充饥。她称这段时间为“挨饿时期”。

然而，机会终究不会亏待锲而不舍的人，法拉奇的才识终于得到了世界名刊《欧洲人》杂志社的青睐，她被该社聘为专职新闻采访记者，自此，法拉奇开始了创造辉煌事业的历程。

摇摇摇摇名扬四海的政治采访

摇摇法拉奇在《欧洲人》杂志前后工作长达 40 余年，这期间及以后一段时期，她还担任过意大利《晚邮报》的驻外记者，为欧洲、亚洲和南美洲许多报刊撰稿，其中包括世界著名的报刊如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以及《生活》《瞭望》等报刊。作为一位知识广博、视野开阔的女记者，法拉奇采访的领域和范围十分广阔。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前期，法拉奇采访对象主要是文化、社会和科技界人物或事件。这时她对采访文艺界的名演员、名作家的内幕新闻很感兴趣，她跟踪、盯住一些电影明星的一举一动和片语只言。欧美著名的影星如英格丽·褒曼、马龙·白兰度、西恩·康纳里等，都和法拉奇亲密地交谈过，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明星生活、事业和爱情方面喜怒哀乐的故事，发表了富有轰动效应的采访稿，被称作“从锁孔里看好莱坞”的报道。1958 年，她将有关这类采访记汇编成册，出版了第一部文集——《好莱坞的七件罪孽》。1964 年又发表第二部文艺采访录《讨厌鬼》。

作为一位女性，法拉奇也十分关心当代妇女所面临的种

种家庭、社会问题、为了全面了解和掌握情况，她对世界各国的妇女现状进行了巡回考察访问，从 20 年代到 30 年代初，她先后去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香港、日本、美国等国家或地区，收集了大量资料，1935 年出版了妇女问题采访专集《无用的性别》，1936 年，她又发表了名为《珀涅罗珀在斗争》的一部有关妇女解放的小说。她的这两部作品对推动当代妇女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到 30 年代中期，法拉奇的采访兴趣逐渐由文化和社会转向政治领域。这时她面对冷战下的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相互对峙的局面，她对一些焦点问题，热点问题很关心，她认为人类的未来乃至生存，都取决于政治家们能否正确作出有益于全人类而非一己私利的正确抉择。怀着维护世界和平的崇高责任感，法拉奇涉足杀机四伏、风波迭起的政治、军事领域。她不顾风险，甚至将生命置之度外，常常出现在战火纷飞的战场，元首领袖的会客室，乃至血腥的大屠杀现场。

法拉奇对世界政治风云的兴趣始于 30 年代中期在美国的采访，当时美苏两国展开了剧烈的太空角逐，两国科学家在航天技术上不断取得进步，这些激起了法拉奇的好奇心。她来到美国采访，大量接触航天科技人员、宇航员，甚至科幻小说作家，参观了美国国家航空局和宇宙航行局，还在卡纳维拉尔角观看了一次载人火箭的发射。1958 年她出版了《如果太阳毁灭》一书，用日记及与父亲交谈的方式，详尽报道了美苏太空角逐战的方方面面，表达了她对美国所见所闻的思索，以及她对变化中的世界的看法，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角度阐明了自己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和军备竞赛的观

点。此书在美国出版后，虽然有人挑剔它的谬误之处，但还是有许多人称赞它。法拉奇自认为这是她在这个时期最重要、最成熟的著作。

法拉奇另一个采访重点，就是处于动乱。战争和杀戮中的世界各个地方。20世纪50-60年代，地球上很多地区都发生了政治动荡或战争杀戮。法拉奇受《欧洲人》杂志派遣，先后奔赴战火纷飞、暴力不已的越南战场、印度——巴基斯坦战场、中东冲突和拉美动乱地区采访，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进行及时的现场报道，“当事件的见证人”，“在事件发生之时写出历史”，是她奉行的原则，也是她的新闻采访具有强烈吸引力的所在。

在印度支那采访日子里，她三进越南，冒着枪林弹雨参观了美军和南越部队的丛林哨所。乘飞机观看过几次轰炸，采访了各种人物，包括越南游击队员。她和游击队战士们一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在一支百来人的队伍中，她往往是惟一的女性，生活上有许多不便，但她以顽强的毅力忍受着，她在潮湿闷热的热带雨林和陡峭险峻的高山峡谷中，顶着呼啸的枪林弹雨，四处跋涉访问。她后来自述当时的情景道：“我在越南与巡逻队一起走在可能埋有地雷的小路上。那时我注意每一点响声，设法跟着别人的脚印走。我知道这也无济于事。我的鞋子可能踩着别人只差几厘米而没有碰到的地雷。我后悔说过‘我跟你们一起去’。我真想回去，真想大喊：‘你们这该死的战争与我有什么相干。’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在这种令人胆战心惊、不寒而栗的残酷战争环境中，法拉奇以一个普通妇女罕有的勇气，坚持深入前线采访，广泛接触了国家元首、三军司令到士兵、游击队

员等各个阶层人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这一场旷日持久，死伤惨重的越南战争有了较全面、清醒的认识。在1967年和1968年，由于她出色的越南战地通讯，而两度荣获意大利最高新闻奖——圣·弗森特奖。后来，她用意大利文出版了一部有关越南战场经历的自传性著作《不用祈祷》。在书中，她表达了自己对生活新的思索：“生活的意义在于做一个人而不是树或鱼；在于寻求正义，因为天地间有正义存在；如果没有，你应当没法使之存在，死不足道，而重要的死在正义一方。”此书出版后，1968年度获畅销书奖——班卡瑞拉奖。

以后，法拉奇到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城采访时，一次正好遇到一次大屠杀事件。她在现场目睹了那惨绝人寰的悲惨一幕：“我看见从台阶上滚下来的尸体，也看见过一头栽倒的尸体：我看见过机枪的子弹揭下了一个小孩的头盖骨，另一个小孩趴在他的同伴身上哭喊道：‘乌贝尔托，他们把你怎么了，乌贝尔托！’这时第二梭子弹打中了他，他的躯体立即被子弹分成了两段。”这场杀戮使上百人死亡，法拉奇也中了数弹，差一点丧命。她的报道饱含着对残酷杀害人类暴行的无比仇恨。法拉奇为伸张正义而不惧牺牲的精神，一时在新闻界传为佳话。

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法拉奇把采访对象主要定位于各国的政坛要人。但是这些要人中有的声名显赫却深居简出，甚至不愿抛头露面，因此要会见他们往往要花费很大工夫，打通各种关节，经过法拉奇呕心沥血的努力，排除重重障碍，终于先后成功地采访了亚、非、欧、美洲、拉丁美洲各国在世界舞台上影响较大的政治家和传奇式人物，

共达 100 多人。其中有基辛格、英迪拉·甘地、班达拉奈克夫人、布托、阿拉法特、卡扎非、霍梅尼、海尔·塞拉西、侯赛因、西哈努克亲王、梅厄、勃兰特、苏亚雷斯、瓦文萨等等。她还访问了邓小平。因为其采访记的不朽新闻价值，所以她的作品被誉为“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在这些成功采访的背后，法拉奇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她在那部名扬世界的《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约见他们经常需要花九牛二虎之力。他们几乎总是使人心寒的不予理睬，或拒绝回答我的请求（实际上本书的 100 个人并不是我希望会见的全部人物），即使最后同意接见我，也要让我等几个月以后才给我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的时间。”据说，她曾接连十几年申请去苏联采访的签证，但总是被拒绝。1956 年，她抓住意大利外长访苏的时机，又前往苏联领事馆，她站在门口按了两小时的门铃，一个手指按红了，换另一个；又红了，再换第三个。就这样用十个手指按铃，直到苏联领事馆人员心烦意乱，不得不给她办了签证。

法拉奇对政要人物进行采访前，为了全面掌握他们的性格特征，社会历史经历，气质爱好乃至他们的家庭状况、生活态度等等，往往要“像学生准备大考”一样，尽可能全面收集、阅读被采访对象所在国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各种材料，以及被采访者的生平事迹及所有背景材料。许多政治领袖的活动有严格的保密性，法拉奇总是不遗余力地想方设法去搜罗、发掘和探听。她每次出访前看过的材料，一般都达几公斤重。通过大量的材料准备工作，使法拉奇掌握了采访的主动权，使其采访成为“由新

闻

闻记者主持的讨论和谈话”。

至于临到实地访问时，她更是兢兢业业、全神贯注、思维处于高度紧张活跃之中。她说，当她“进行一次重要采访时，往往深感苦恼，就像隐藏在历史丛林中的小虫子那样，害怕缺乏足够的眼睛、足够的耳朵去看去听，去理解这些人物。”法拉奇也承认，每一次长时间的访问，都是对她智慧和敏感的挑战，是消耗她的灵魂一次人类实验。因此，每次采访后，她都会消瘦一些。

法拉奇人物采访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她的勤奋，还表现在她除了母语意大利语外，还靠刻苦自学熟练掌握了英、法、西班牙三种语言。这样便扩大了与被访者语言交流的途径，可以不经过翻译，创造一种彼此沟通、自然的语言环境，从而有利于交谈的顺利进行和深入发展。

在采访中，法拉奇一般的方法是采用录音机当场录下她与采访对象间的全部谈话内容。然后再将对话不加删减增添地以其原始形式全文发表，仅在对话前加一说明性序言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她认为用这种方法可以既保持采访内容的客观公正及其真实性，避免人为的加工和篡改行为，也阐明采访者的立场和观察感受，并使自己的倾向性不致介入到采访的内容和复述之中去。当然强烈的个人观点、思想情绪已贯注于各种提问中，而这正是她的采访具有独特吸引力的所在。她的访问记，有时简直就是一部高潮迭起、悬念不断的剧本创作。

法拉奇的人物采访形式灵活多变，技巧高超。她称“人物采访是一出戏、一场战斗，对话生动、交锋激烈”。人们用“法拉奇风格”来称呼她那富有刺激性、进攻性的

人物采访方法。美国的一些大学开设了专门研究法拉奇采访技巧的课，在世界其他国家新闻学的教科书中也有对法拉奇采访技巧与方法的介绍。

法拉奇的风格，首先在于紧逼直追，勇于发问。法拉奇认为采访风云人物的记者，绝不能拘谨得像个怕羞的少女，怯弱得像个奴仆。法拉奇采访任何人，不论其名声如何显赫，地位怎样高，她总是不卑不亢，以完全平等的身份出场，努力忽视双方在地位上的差距。她认为，国王有“陛下”的威严，记者有“无冕之王”的尊严。仰着脸看人，看不清人的真实面目，还会把脖子累疼。在采访时，她常常这样提醒自己，也提醒被采访者：这是我的访问，我访问的是你，只有你不能回答的问题，没有我不能提的问题。

请看她访问自称“一句话能使整个世界爆炸”的具有无尚权威的利比亚总统卡扎菲时的对话：

摇摇法拉奇：请你告诉我，上校，你真的相信你的这本小绿书（指卡扎菲的著作）的哲学会改变世界？

卡扎菲：毫无疑问，是的，毫无疑问。绿书是人类斗争的产品，绿书是福音，新福音，新世纪的福音，群众的世纪。

法拉奇：你有点不谦虚，对吗？

卡扎菲：对，我不谦虚，因为我可以抗拒全世界的攻击，因为绿书已解决了人类社会的问题。

法拉奇：那末，这样你就是一种弥赛亚（即救世主）了。新弥赛亚。

一个接着一个的提问，惹怒了卡扎菲，他对法拉奇高声吼叫：“我就是福音”。法拉奇却冷冷地打断他的话说：“停